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我国教育学教材建设的回顾与启示

侯怀银¹, 周邳壹²

(1. 山西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太原 030006; 2. 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广州 510631)

摘要:中国共产党领导教育学教材建设工作的百年史, 既是一部独立探索的发展史, 又是一部与时俱进的创新史。回顾这一历史进程, 中国共产党紧紧围绕不同时期的教育工作重点, 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教育学教材建设道路。在党的领导下, 我国教育学教材建设取得了瞩目成就, 教材数量多、门类全、受众广; 教材内容体系不断完善; 教材结构从模仿到逐步自立; 教材的中国特色日益显现。进入新时代, 中国教育学教材建设需要明确: 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是我国教育学教材建设的根本保证; 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是我国教育学教材建设的方向引领; 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是教育学教材建设的坚实根基; 建设中国教育学教材是我国教育学教材建设的根本目标; “编研结合”是教育学教材建设的质量保障。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教材建设; 中国教育学教材

中图分类号:G42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0186(2022)05-0018-08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教材建设工作,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党领导我国教育学教材建设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我们有必要回顾党领导下教育学教材建设的百年历程, 总结其中的宝贵经验, 并寻求对当下教育学教材建设的启示。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教育学教材建设的历程

根据不同历史时期教育工作重点, 可以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教育学教材建设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的教育学教材建设工作(1921—1949年)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发展教育事业, 为培养师资力量, 领导各根据地广泛兴办师范教育。1931年3月, 徐特立创办了第一期“师资训练班”。在此基础上, 闽瑞师范学校、国立高级列宁师范学校、江西省立列宁师范学校、龙岩师范学校、闽西列宁师范、赣东北省立列宁师范学校等先后在中央苏区创立。1937年, 经中央苏维埃政府批准, 在延安创办鲁迅师范学校, 而后陆续创办了边区第一师范学校、第二师范学校、第三师范学校。为缓解师范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教育学重大课题“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发展与创新研究”(VΛΛ210003)。

作者简介:侯怀银, 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教育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中国教育学史研究; 周邳壹,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

教育迅速发展所带来的教育学教材短缺问题，中国共产党主要从以下三方面领导根据地教育学教材建设工作。

第一，明确教材建设的政治导向。中国共产党结合各阶段的革命任务和教育工作重点，为民众树立起新的思想观念。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和方法来教育民众，激起广大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觉悟，抵制国民党实行的“党化教育”和“三民主义教育”。1931年11月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其中规定：“取消一切麻醉人民的封建的、宗教的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教育”^[1]。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党中央提出“教育为战争服务”，要求坚决与一切反抗战、反团结、反进步的思想进行斗争，同“皇民化教育”“奴化教育”等日本殖民地教育进行坚决斗争。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土地改革，结合翻身运动，进行翻身教育，禁止使用日伪教材和国民党教材。党对教材政治导向的规定为我国教育学教材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第二，设置专门机构进行教材编审工作。1931年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成立，统一管理根据地教育工作。翌年6月决定在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内设立教材编审委员会，由徐特立担任委员会主任。1933年4月，苏维埃人民委员会批准《省、县、市、区教育部及各级教育委员会的暂行组织纲要》，设立地方苏维埃编审出版机构。同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明确地方苏维埃编审出版机构及其职能。由此逐步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教材编审格局，各根据地教材编审机构日益健全。

第三，组织人力、物力编写教育学教材。在党的领导下，中央教育部编写出版了《教育学讲义》全一册、《小学组织法》全一册、《国语教学法》全一册、《心算教授书》等；中央列宁师范学校编写的《教学法》全一册等，成为各校普遍采用的教科书。在教育学教材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尤其注意加强无产阶级教育，要求以马列主义为根据，介绍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文化。以1930年8月《教育学讲义》为例，这本教材是闽西列

宁师范暑期学校的讲义，改编自杨贤江的《新教育大纲》，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教育基本原理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其出版发行成为这一阶段教育学教材建设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的教育学教材建设工作（1949—1978年）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为使教材事业更好地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积极吸收借鉴苏联经验，独立进行本土探索，为我国教育学教材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导。

1. 对苏联教育学教材的学习和借鉴

新中国的成立带来了社会性质的变化，由此引发了教育上的变革。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编写社会主义性质的教育学教材就成为当时教育学教材建设的首要任务。

一方面，优化教材编写组织机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国教材编审机构初具规模，但内部组织划分并不完备。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教育环境得到明显改善，这为教材编写组织的系统优化提供了条件。1950年7月通过了《教育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的领导下，成立高等学校教材编审委员会。^[2]这是拉开了新中国教材建设工作的序幕。1952年4月，教育部又组成了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审委员会。^[3]各个组织之间的职能更为明确，为教育学教材建设事业提供了组织保障。

另一方面，明确学习和翻译苏联教育学教材。1949年12月23日，教育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我国新教育的建设，特别要借鉴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4]，苏联的教育理论、教育制度以及教材教法在社会性上与我国一致，在科学性上也是先进的^[5]。1952年，教育部印发了《师范学校教育学教学大纲》以供中等师范学校教学参考。同年11月，教育部颁发《关于翻译苏联高等学校教材的暂行规定》，强调目前高等教育最为迫切的政治任务之一便是翻译苏联高等学校教材，以提高我国教育教学质量^[6]。另外，1954年和1956年，教育部组织编订了一系列适用于初级师范学校、师范学院、师

范本科和专科的教育学教材大纲^①。这些大纲都参考了苏联师范学院教育学教学大纲，按照苏联教育学体系，结合我国过渡时期实际情况制定。由此，我国教育学教材建设逐步走上了翻译苏联教材，并以此为蓝本进行自主编写的道路。

2. 独立探索教育学教材建设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教育学教材建设的目标是构建科学的社会主义教育学教材体系。随着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苏联教育学教材弊病的日益显现，我国开始独立探索中国教育学教材建设之路。

1956年8月，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7]“教育学中国化，是解决存在于教育学的教学和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偏向的关键。”^[8]作为教育学中国化的重要一环，教育学教材自编工作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虽然前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后期由于“教育大革命”的影响，教育学教材编写处于混乱、无序状态。同时，教育界试图破除对苏联教育学的迷信，树立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权威，以毛泽东教育思想为唯一指导思想，要求教育为革命服务，教育学教材逐渐脱离教育本身而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1958年5月，教育部通知师范学校三年级停止使用原有的教育学课程，专门教授我国教育方针和政策的相关内容。^[9]这导致教育学教材最终变为“方针政策学”，尤以1960年上海教育学编写组编写的《教育学》为典型，教育学“中国化”反而“化”掉了教育学^[10]。

1961年之后，党和国家开始反思教材建设走过的弯路，以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原则进行科学、理性的教育学教材建设。1961年2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采用“选”“编”“借”的办法解决教材问题。会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召开了有关会议，有计划地开展文科教材建设工作。这为我国教育学教材编写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方向指引。1961年4月，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对教材中“红与专”“论与史”“书本知

识和活知识”“古与今”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同年8月，周扬针对教育学编写组初步成文的《教育学提纲（初稿）》提出建议，对教材中“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阶级观点与历史观点统一”“正反面”“史论结合”等问题提出了建议。^[11]周扬的建议对教育学教材的编写起到了奠基作用，此后教育学专家和教师相继组成教育学编写组，他们提出教育学教材建设的总体构思，力图突破传统的苏联教材体系，破除“方针政策学”编写模式，推进教育学教材的中国化进程。

在独立探索过程中，教育学教材建设工作也受到当时特殊历史环境影响而被迫中止。1966年至1976年的十年间，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背景之下，教育学教材表现为对毛泽东教育思想、党的方针政策的诠释，引用毛主席语录来代替说理和论证，导致教育学教材的“语录化”，使教育学教材的建设遭到严重影响。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领导的教育学教材建设工作（1978—2012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教育学学科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东风，进入了发展新阶段。在这一阶段，党和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教育学教材建设。党对教育学教材的建设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着手教育学类教材的恢复。1978年6月，教育部制定了《1978—1985年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规划》，包括教育学在内的一批教材得以公开出版发行，改善了文科教材严重缺乏的状况。^[12]1985年4月5日至11日，教育部文科教材办公室在武汉华中师范学院召开了1984—1990年高等学校教育类专业教材编选计划（征求意见稿）讨论会，指出这次计划所列的教材应包括文科各专业必修课和主要选修课的教科书、教学参考书以及可供文科有关专业教学参考的翻译外国的教材和教学参考书。同时，教材的编写实行主编负责制，由教育部出面组织编写；采用“待定主编”的招标方法。^[13]在编选计划的指导下，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一系列教育学教材。这些教材质量较高，多次获得国家级奖励，

^① 这些大纲分别为《初级师范学校教育学教学大纲（草案）》（1954年）、《师范学校教育学教学大纲（试用）》（1956年）、《师范学院、师范专科学校教育学试行教学大纲》（1956年）。

为教育学教材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鼓励教育学教材的自编与引进。1978年以来，为了加强我国高等教育各类专业的教材建设，原教育部和国家教育委员会制定了不少关于教师编写教材的政策性措施，如在《关于高等学校教材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以及《高等学校教材工作规程（试行）》等文件中均落实了各项有关政策。这些措施充分调动了各高校教师，特别是具有较高学术水平与丰富教学实践经验的教师编写高水平教材的积极性，高校教师与高校之间也合作开展教材编写工作。在教材自编的过程中，我国加快引进国外教育学教材。1979年2月，我国颁布了《关于加速引进外国高等学校教材的几项规定》，指出要积极译介苏联、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教育学教材和属于教材性质的著作。随着自编教材与引进教材的出版发行，我国逐步形成多样化的教育学教材建设格局。

第三，大力推进教育学教材的编写落实。1991年3月，国家教委师范司在北京召开全国师范院校（含教师进修院校）公共课教育学教材改革研讨会，^[14]并在会上制订了教育学教材改革实施计划，确定了教材改革的目标（编写《教育学教学指导纲要》，制定各级各类师范院校“教育学教学大纲”，编写一套系列教材，制定一套科学的教学评价标准）、任务和指导思想。同年11月，国家教委师范司在北京召开全国师范院校公共课教育学教材改革调查研究座谈会，会议的目的是为搞好调查研究作准备，以便能切实结合我国的教育实际，编写出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教育学。^[15]1992年3月，师范院校教育学系列教材编写委员会成立并召开首次工作会议。会议讨论制定了《师范院校教育学系列教材编写委员会工作条例》，该文件规定了编委会的工作职责以及教材编写原则。与此同时，国家教委师范司在北京举办了《教育学教学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高级研讨班，研讨班就《纲要》的性质、任务以及教育学中的有关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了讨论，会后还成立了调查研究队伍总结我国教育教学改革经验，为编写教育学系列教材奠定基础。

第四，以教育研究促进教育学教材质量的提

升。1991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2期设置了“教育学改革”专栏，发表了教育学教材研究的系列论文，研究者从教育学教材建设经验、存在问题、改革建议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同时加强了“元教育学”问题的研究，为我国教育学教材建设提供了一定学理支撑。这一年关于教育学教材的研究成果颇多，可谓达到了顶峰。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党领导的教育学教材建设工作（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教材建设事业呈现新态势。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培养出好的哲学社会科学有用之才，就要有好的教材……要抓好教材体系建设，形成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立足国际学术前沿、门类齐全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16]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凸显了党中央对教材建设的高度重视，也为中国教育学教材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全面加强党对教材建设事业的领导。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国家教材制度，成立专门的国家教材委员会来组织和管理全国教材工作。2017年3月，教育部成立教材局，主要负责拟定全国教材建设规划，制定完善的教材建设制度，加强教材信息化建设。2019年12月，国家教材委员会、教育部印发了全国教材建设规划和四个教材管理办法，部署推进大中小学教材建设。其中《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着重解决了高等院校教材管理的责任主体问题，要求高校承担主体责任，处理好管理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建立健全教材编审和选用制度，鼓励专家学者积极参与教材的编写过程。这一系列措施使我国教材建设体制机制更加完善，教育学教材建设工作更加高效。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教育学教材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教育学教材建

设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

(一) 教育学教材数量多、门类全、受众广

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公开出版的各类别、各层次的教育学教材数量达570余本,尤以改革开放以来为高峰期。这些教材门类齐全,适用范围广泛,涵盖了教育系本科教材、高等师范院校公共课教材、中等师范学校教材、师专公共课教材、高等教育学教材,以及卫星培训教材、干部培训教材。其中不少教材成为后世教育学教材的典范。“文化大革命”前由刘佛年主编的《教育学》(讨论稿)几乎成为教育学“母版”教材。1980年华中师范学院、河南师范学院、甘肃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学院和武汉师范学院五院校联合编写《教育学》,之后由王道俊和王汉澜修改编订,并于1988年出版新编本第1版,至今已出版第7版,成为发行量最大的教育学教材,这本教材“可以看作教育学本土化的成功典范”^[17]。1984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编写的《教育学》。这本教材是在1980年编写的《教育学》基础之上修改完成的,“力求反映我国的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果”^[18],成为高师教育系专业基础课教材。

(二) 教育学教材内容体系不断完善

我国教育学教材建设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点,前后形成两个具有不同发展特征的阶段。改革开放前,教育学教材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无论是内容、体系还是结构都以模仿为主,我国教育学教材的编写还只是一个设想,并未完全实现;改革开放后,随着教育学研究的开展,教育理论、教育实践,教育学学科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些成果丰富和完善着教材的内容和体系。

随着教育学人对教育本质、教育价值的深入探讨,以及对世界性教育改革理论问题的研究,教材编写者不断对教材基本内容进行调整和补充,如改变传统的用教学代替智育的观点,在教育内容的阐述中,确立了智育的独立地位,将之与德育、美育、体育、劳动教育同样列为专门的章节进行研究,深入反映现代教学理论对于掌握知识与发展智能关系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

学界围绕教育起源展开讨论,就教育学逻辑起点提出不同看法,在教育价值观上进行论辩。21世纪初,针对教育是否存在本质规定、创生中国教育流派所需条件、中国教育走向等进行的分析,都使教育学的基本概念和问题得到深入研究。^[19]教育学基础理论研究无疑对中国教育学教材建设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教育实践上,出现行动研究、教师专业发展、人工智能教育、教育改革等研究热点,教育学的研究得以拓展。随着教育学分支学科逐步分化与融合,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管理学的交叉学科发展壮大。这些教育理论、教育实践、学科发展等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在我国编写出版的教育学教材中都有所体现。

(三) 教育学教材结构从模仿到逐步自立

作为舶来品,教育学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从外来到本土化的过程,相应地,教育学教材也逐步由模仿走向了自立。综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教育学教材建设历程,我们可以发现,结构创新是最突出的成就,由此形成了一批具有特色的教育学教材。有的教材从教育学学科属性出发,以“理论与实践”为主干进行教材编写。这样的编排遵从理论—实践的逻辑顺序,在理论部分主要探讨教育的基本问题和一般规律,实践部分为学生呈现学校教育的实际问题和工作程序,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还有的教材注重逻辑联系,形成从宏观到微观的“新三篇”。这类教材主要分为三部分内容:一是宏观篇——教育与人类社会;二是中观篇——学校教育结构;三是微观篇——学校教育活动。这类教材通常弱化了管理板块,体现出由赫尔巴特“三中心论”向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的转变。另外,叶澜主编的《新编教育学教程》,采用对教育认识从功能到实践、从学校外部到学校内部、从一般到具体这一结构进行编排。^[20]还有如袁振国主编的《当代教育学》、傅道春编著的《教育学——情境与原理》等,在内容和结构上都具有很大的创新性。这些教材体现了我国教材编写者对中国教育学教材的有益探索。

(四) 教育学教材中国特色日益显现

我国教育学教材建设是在教育学中国化的探索中进行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教育

学教材逐步显示出“民族性”“本土化”特色。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育学教材多注重反映我国教育改革成果,体现了一定的时代性。如余文森主编的《新课程背景下的公共教育学教程》一书,突出了时代性、人文性和实践性的特征,密切联系我国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实际,把新课程改革的精神贯穿于教育学教材之中,较好地反映了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现状,是联系中国实践较为紧密的一本教材。还有一些教材旨在满足现实教师需求,观照我国教师专业发展。如由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编写组编写的《基于教师资格考试的教育学》,该教材以满足教师资格考试为出发点,对符合教育学逻辑体系要求的内容和教师资格考试大纲所涉及的内容进行了有机整合。该教材理念先进、结构完整、重点突出,源于考纲,又超越考纲,增补了现代教育思潮和理论的内容,特别是反映当下素质教育改革的现状与要求的内容,还探讨了在现代法治社会背景下,未来教师需要了解的相关教育法律法规等内容,贯彻了与考纲挂钩、反映教育改革现状的编写原则。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教育学教材建设的启示

(一) 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教育学教材建设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狠抓根据地教材建设工作,为教育学教材建设积累了初步经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教育工作领导权,统筹我国教育学教材建设工作,组织教育学教材编写,在借鉴苏联经验的同时,强调与中国具体国情的结合,独立探索中国教育学教材的建设。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教育事业得到恢复和发展,教育学教材建设也迎来了良好的发展契机。我们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对待国外教育学教材,采用全方位、立体化的教育学教材引进机制,并扎根本土,编写出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教材。进入新时代,教材管理部门落实教材工作会议精神,树牢责任意识 and 阵地意识,加强工作统筹,强化教材监管,进一步开创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新局面。

我国教育学教材建设工作取得重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在于党的领导这一政治和制度优势的发挥。中国共产党始终将教材建设作为重点关注领域进行统筹规划,通过树立政治导向、完善编审制度、组织教材编写等措施,为教育学教材建设提供了方向引领和组织保障。进入新时代,面对新机遇和新挑战,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确保正确的前进方向,才能源源不断地为教育学教材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二) 马克思主义是我国教育学教材建设的思想指引

党领导我国教育学教材建设事业取得重大成就得益于科学理论的指导。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教材建设的初步探索,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模仿借鉴苏联教育学、独立建设中国教育学教材,再到改革开放后的解放思想、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教材的过程中,尽管各类教材对教育学基本问题、基本概念的阐述有所差别,但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范围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教材编写的灵魂,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而非必须直接引用马克思主义的语句。历史上我们曾走过一段弯路,使教育学教材成为方针政策和语录汇编。周扬在1961年提道:“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是把它作为红线,作为灵魂,进行总结。教科书不同于具体政策,如果句句都引用毛泽东主席的话,就会使‘帅’变成兵将,红线变成红布,灵魂变成肉体了。”^[21]也就是说,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才能更好推动教育学中国化进程,确保我国教育学教材建设事业稳步向前。

(三) 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是教育学教材建设的坚实根基

教育学基础理论是指在教育学这门学科发展过程中具有起始意义的基本理论,它为学科发展提供最基本的理论依据和学理支撑,是教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基础。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教育学教材建设历史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学教材建设事业的繁荣发展得益于教育学的恢复与发

展,以及教育学研究的逐步深入与拓展。无论是对教育本质、教育起源、教育价值,还是中国教育学走向等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探讨都是对教育学教材内容体系的极大丰富与完善。加强教育学基础理论研究会对我教育学理论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为教育学教材体系的构建提供理论支撑。在教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教育学元问题的研究要尤其重视,它是对教育学学科定位的反思,以更加系统的方式对我国教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进整体反思和系统研究,也是科学的教育学概念体系得以构建的根本。只有对基础理论不断拓展和深化,教育学教材水平才能逐步提升。

(四)建设中国教育学教材是我国教育学教材建设的根本目标

中国教育学教材既要借鉴西方教育学理论体系精华,又要彰显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其构建要以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中国现实教育实践经验以及中外现代教育思想理论为基础。教材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底蕴。中国的教育文化渗透着五千年来我国的文化元素,内含中国文化特有的认识论、方法论以及思维方式。教育学教材建设是建立在对自身文化认同基础上的创新活动,应该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继承,弘扬我国优秀的教育文化和教育元素,坚定文化自信。这是教育学教材建设乃至教育学科发展的基础。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中国教育学教材的建设不能忽视中国教育的具体实践。同时,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对中国来说是外来的而不是内生的,外来的教育学依靠本土教育实践得以生存。这一特点使中国教育学教材的建设仍需要创造性吸收国外先进的教育思想理论,批判地、创新地吸收国外先进的教育科学理论,对其进行筛选与剔除,不照搬照抄,使之成为中国教育学教材的合理内容。

(五)“编研结合”是教育学教材建设的质量保障

教育学教材的编写既要遵循教学规律,又要体现学术价值,是一项具有学术性、专业性、复杂性的学术创造活动。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有研究者对教育学教材进行了探讨,提出教育学教材编写的两条道路,两种方法^[22]。改

革开放后,《教育研究》杂志于1982年第5期开辟教育学教材研究专栏,我国研究者开始从理论上对教育学教材进行研究。1991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设置“教育学改革”专栏,研究公共课教育学教材改革。教育学教材编写作为教材建设的重要一环,必须将教育学教材的编写与教育学教材本体研究相结合,才能有效提高教育学教材质量。一方面,教育学教材的编写是一种科学研究,只有以科研的方法和精神去编写教材才能确保教材质量^[23];另一方面,教材的编写也有助于推动科研进步,编写教育学教材,需要将教育学学科最新研究成果、思想理论精粹、前沿热点问题进收集整理,这对于今后教育科研来说,具有一定的铺垫和启迪作用。

参考文献:

- [1] 陈元晖, 璩鑫圭, 邹光威. 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1: 27.
- [2] 关保英. 教育行政法典汇编 1949—1965 [G].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6: 22.
- [3] 何东昌.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 上 [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7: 117.
- [4] 廖盖隆, 庄浦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 [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9.
- [5] 进一步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 迎接中苏友好月 [J]. 人民教育, 1952 (11): 4-5.
- [6] 高等教育部办公厅. 高等教育文献法令汇编 1949—1952 [G]. 高等教育部办公厅, 1958: 72.
- [7]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 第7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83.
- [8] 孟宪承, 廖世承, 张耀翔, 等. 为繁荣教育科学创造有利条件 [J]. 人民教育, 1957 (7): 42-47.
- [9]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 1949—1982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4: 219.
- [10] 侯怀银, 王喜旺. 教育学中国化: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学者的探索和梦想 [J]. 教育科学, 2008 (6): 6-10.
- [11] 周扬. 周扬文集: 第4卷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72-90.
- [12] 李家宾. 高校文科教材建设简讯 [J]. 人民教育, 1979 (12): 34.
- [13] 杨新. 1984—1990年高等学校教育类专业教材编选计划(征求意见稿)讨论会在武汉召开 [J]. 华

- 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1985(2): 41-42.
- [14] 连秀云, 赵焯. 全国师范院校公共课教育学教材改革研讨会综述 [J]. 课程·教材·教法, 1991(Z1): 11-14.
- [15] 殷忠民. 国家教委召开教育学教材改革调查研究座谈会 [J]. 课程·教材·教法, 1992(1): 62-63.
- [16]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6-05-19(2).
- [17] 周兴国. 教育学本土化努力与解释体系的确立: 王道俊主编的《教育学》(1980年版)及其历史镜像 [J].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10(6): 6-10.
- [18]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编写组. 教育学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4: 编者的话.
- [19] 郑金洲. 改革开放30年的教育学研究 [J]. 教育研究, 2009(3): 26-36.
- [20] 韩华球. 关于教育学教材建设的再思考 [J].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17(6): 31-35.
- [21] 周扬. 周扬文集: 第3卷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 197.
- [22] 孙陶林. 建立我国教育学, 革新教育学的教学工作 [J]. 学术月刊, 1958(8): 25-28.
- [23] 郭文安. 教育学教材编写的思考 [J]. 课程·教材·教法, 2011(1): 33-43.
- (责任编辑: 穆建亚)

The Review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Pedagogy Teaching Materials in Chin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ou Huaiyin¹, Zhou Zhiyi²

(1.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Shanxi 030006, China;

2.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1, China)

Abstract: The hundred-year histor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pedagogy teaching materials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not only a history of independent exploration, but also a history of innovation that keeps pace with the times. Reviewing this historical proces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losely revolves around the key points of educational work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nd walks out a road of the construction of pedagogy teaching material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the construction of pedagogy teaching materials in China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teaching materials are characterized by a large number, a full range of subjects and a wide audience; the content system of teaching materials is constantly improved; the structure of teaching materials has changed from imitation to gradual self-support;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f teaching material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apparent. In the new era, the following principles need to be clearly identifi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edagogy teaching materials in China: strengthening and improving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i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adhering to and consolidating Marxism is the directional guidance; strengthening basic theoretical research is the solid foundation; building pedagogy teaching material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fundamental goal; and “the combination of editing and research” provides quality assurance.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pedagogy teaching materials in China